

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大陸 的經濟發展*

陳永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四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中國大陸自從一九七八年進行改革開放後，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其經濟發展中，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先就文獻中對FDI產生的原因、利用外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性、及可能產生的效應作一說明，並認為利用外資並非經濟發展的充份條件，還必須加上其他因素（如產業政策、外資政策等）的配合，才能對東道國產生助益。本文乃以中國大陸為例，討論FDI與其經濟發展的互動，發現外資對大陸的經濟發展，在資本累積、進出口貿易、就業率的提高及制度示範效果等方面，均有著正面的貢獻，但在技術轉移方面則仍有待加強。外資的進入，亦帶來了相關的問題，諸如通膨壓力、逃漏稅與價格轉移、技術研發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瓜分國內市場，及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等等。在正負效應之間，大陸以利用外資政策加以調控與規範，包括放寬投資領域、改善宏觀投資環境、加強法律規範與開放投資區域等等，並與其產業政策相呼應。總體來說，過去二十年，大陸的外資政策，是配合其經濟發展的目標而制訂與調整，其政策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經濟發展、利用外資政策

* * *

一、前言

自大陸採行開放政策以來，外國直接投資是其經濟發展過程中，極力爭取的標的。縱使其內部對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角色、規模與效益常有討論與爭議，但中國大陸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已超過二十年。究竟這二十多年來，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

* 本文乃根據國科會專題計劃（計劃編號為 NCS88-2415-H-004-011）之部份改寫而成。

的經濟發展，扮演的角色如何？其發展有何特色？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何種效應？是值得持平來探討的。

本文將先簡要地說明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及其可能帶來的效應，繼而將探索中國大陸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情勢及其特色，並對外國直接投資對大陸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應及產生的問題作一剖析。最後，將提出總結意見。

二、理論回顧：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

首先，我們需要為外國直接投資作一定義。一般來說，一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投資者直接在他國以各種形式設立廠礦等企業的投資方式，其主要特徵是投資者以取得投資企業的部份或全部控制權，並直接參與該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利潤分配。間接投資是指投資者不直接擁有企業控制權而旨在獲得資本利息收入的投資，其主要形式有政府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出口信貸、租賃信貸、發行國際債券等。本文僅著重於外國的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

在經濟學的文獻中，對外國直接投資產生的原因、對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及正負效應、及影響外國直接投資效益的因素，已有豐富的成果，以下簡要歸納說明如下：

（一）外國直接投資產生的原因

有關企業對外進行投資的動機，曾有許多學者討論，如獲取資源、求取利潤最大化、爭奪市場、分散風險、提高產業競爭力等等，其中要以鄧寧（John H. Dunning）在一九九三年所發表的論點，最為完整。他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綜合地分為六種類型：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效率導向型、策略資產導向型、貿易流通型、支援性服務型。不同類型的動機就有不同的策略目標，簡單表列如表一。

鄧寧認為，早在六、七十年代時，一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其動機多以獲取資源、開拓市場為主，但至八、九十年代，跨國公司的興起，其對外投資常以推進公司的區域化或全球化的目標為考慮，在資源的配置上，亦以區域或全球的策略為考量。考慮選擇對某國進行投資，相對於其他國家是否有利於其區域或全球戰略，該地是否可使其得到新的市場，或是其全球性行銷策略的重要部份，或者是其產品多樣化的組成部份，甚至考慮「只有在當地可以提供更高利潤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才有可能在開發中國家投資，只有在有希望獲得長期高額收益的條件下，它們才有可能進行技術革新、培訓和提高國內資源利用率等方面的工作」^①。總之，現代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再是以選擇某定點、獨立的市場為著眼點，而是以全球化的觀點為出發點，以投資效率的衡量為主，並以相適應的投資策略與行銷策略為輔，以期獲取利潤的最大化。只有在此前提下，在投資的過程中，才有可能為東道國進行技術革新、培訓人才等工作。

註① 鄧寧，「重估外國直接投資的利益」，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在北京「跨國公司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管理世界雙月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頁一六一。

表一 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類型與其策略目標

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類型	跨國公司的策略性目標
1. 資源導向型	獲取比競爭者優先利用資源的特權
2. 市場導向型	(1) 保護既有市場、干擾競爭者行爲 (2) 維護壟斷優勢，阻止對手或潛在對手開拓新市場
3. 效率導向型	(1) 全球或區域性產品合理化 (2) 獲取生產過程專業化優勢
4. 策略資產導向型	(1) 強化全球創新能力或提高生產競爭力 (2) 得到新的生產線或市場
5. 貿易流通型	進入新市場或作為全球或區域性行銷策略的一部份
6. 支援性服務型	全球或區域性產品多樣化策略的一個組成部份

資料來源：John H.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ngland Workingham: Addison-Wesley Publisher Ltd, 1993), Table 4.2.

(二) 利用外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要性

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若要追求經濟成長，有必要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以下幾個理論便是對此必要性的闡釋：

1. 儲蓄缺口理論

此一理論由羅森斯坦－羅丹（D.N. Rosenstein-Rodan）提出，認為開發中國家由於勞動生產率低、人均收入水平低，而導致儲蓄率低。儲蓄率低限制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的成長速度。當該國實際的儲蓄率與其計劃達到的經濟成長率所需要的儲蓄率之間所存在的差額，即為開發中國家的儲蓄缺口^②。通常，當國內儲蓄缺口存在時，可利用外資作為國內儲蓄的補充，彌補國內儲蓄與計劃所需投資規模間的缺口，以實現預期的目標經濟成長率。

2. 外匯缺口理論

與經濟發展中利用外資的儲蓄缺口理論相對應的是外匯缺口理論，是由巴拉薩（B. Ballasa）、麥金農（R. Mckinnon）等人提出，其基本論點認為：開發中國家出口創匯能力的低下及外匯收入過低，而導致了外匯缺口的產生，而制約其進口能力。其儲蓄缺口的產生常是因外匯缺口所導致的。因外匯的不足，使許多急需進口的技術設備、原材料等無力進口，制約了經濟成長的速度。利用外國的直接投資作為一種外匯來源，以此來擴張該國的進口能力，從而促進經濟成長^③。

註② D.N. Rosenstein-Rodan, "International Aid fo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3, 1961.

註③ R. Mckinnon, "Foreign Exchange Constrai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t Aid Allocation," *Economic Journal*, vol. 74, 1964.

3. 兩缺口理論

兩缺口分析理論是由錢納里（H. Chenery）和斯特勞特（A. N. Strout）根據前二項理論發展出來的，其基本論點認為，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儲蓄、投資、進口和出口等四個方面。這四個因素相互作用，使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時會受到儲蓄不足、外匯不足的約束。這兩大缺口造成開發中國家國內生產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從而遏制了經濟發展的進程。解決的方式是利用外資來填補兩個缺口，並緩解經濟成長中的瓶頸約束，以加速經濟發展。外資一方面能增加開發中國家的出口能力，從而彌補外匯缺口；另一方面則能增加該國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則可相應的增加其儲蓄水平，因而填平儲蓄缺口^④。而在利用外資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利用外資來彌補儲蓄和外匯缺口，更重要的在於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同時也進行技術變革，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與資本使用效率。

4. 其他缺口理論

托達羅（M. P. Todaro）認為，利用外資來加速經濟發展，不僅可以消除儲蓄和外匯缺口，還可以彌補的第三個缺口是「政府既定的稅款收入目標與當地徵收到的稅款之間」的稅收缺口。此外，開發中國家在管理、企業家能力、技術與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口，托氏相信外國私人廠商的經營能夠部分地或全部地彌補這方面的缺口^⑤。

(三) 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發展的效應

正如上述外資理論所述，開發中國家願意引進外國的直接投資，是因為外資能彌補經濟發展各環節中的資本缺口，反映在各個經濟層面，大體可歸納出以下幾種效應：

1. 資本效應：利用外資幫助開發中國家填補儲蓄與投資間的缺口；
2. 貿易效應：利用外資的進入，解決進口大於出口所造成的國際收支逆差問題；此外，利用其本身在勞動力、土地及原料的比較利益，發展外銷及進口替代產業，促進出口的增長，或者由進口最終產品轉為進口中間原材料，以完成經濟結構的改變；
3. 技術效應：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引進，以促進國內技術創新，創造出適用於國內生產所需的技術，並彌補開發中國家國內技術、管理、企業家才能等方面不足，培養適合本國經濟的企業家階層，利用外資企業的資金與技術條件來培訓國內的勞動力、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以提高人力素質；
4. 就業效應：外資的引進，不但是人力素質的提高，並可擴大國內的就業，尤其

註④ H. 錢納里，A. M. 斯特勞特，「外援和經濟發展」，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八期）（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三年），頁二〇六～二〇七。

註⑤ 托達羅，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〇二。

是熟練工人的就業^⑥；

5. 制度效應：透過外國的直接投資，可能影響東道國的政經制度，如經濟體制的轉型，配套法律制度的建立等等。其中尤以市場制度的引進，刺激轉型國家國內市場的發育和市場機制的運作最為普遍。經由市場的建立，消除國內在自由貿易與要素流動方面的障礙，促使生產要素進行合理流動，發展國內各地區之間、國內與國外之間的貿易往來，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進而帶動產業聯動的效應，促進國內的經濟成長。

戰後數十年，開發中國家爲了彌補經濟發展所存在的缺口，積極引進並利用外資，其中雖不乏成功的經驗，亦有不少效果不彰的例子，足見利用外資並不完全是經濟發展的充份條件。上述各項效應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之中，需視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充分發揮，例如生產要素的成本、市場的規模和特性、自然資源的賦予程度、適當的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東道國本身的吸收能力等等，均影響到外資利用的效益。本文乃以中國大陸爲例，檢視其外國的直接投資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

三、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中國大陸願意引進 FDI 的主要原因，是爲了達到追求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利用外資來填補其資本、技術、稅收、管理等等的缺口有其必然性。外資企業進入大陸的主要意圖，不外是爭取資源、市場、甚至爲其全球化的目標而作資源的配置，以達到經濟的效益。在二者的互動中，雙方是否能各取所需，達到目標，利用外資的政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大陸當局必須根據其本身的經濟情勢，制訂利用外資的政策，決定 FDI 進入的多寡、發展的規模，並要觀察所產生的效應，或解決相關的困難，以期達成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另一方面，FDI 則根據企業自利（self-interest）的原則，以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資源配置的最大效率爲目標，其具體的行爲之一是以進入的多寡來因應，因此，外資每年進入的金額可成爲檢驗的指標之一。表二將一九七九～一九九九年 FDI 在大陸的投資狀況，作了簡單的表列。

總體來說，大陸與外商所簽訂合同（協議）的總金額達 6134 億美元，實際利用的金額約 3059 億美元，資金到位的平均率爲 49.86 %。就簽訂合同的項目數與協議的金額而言，是以一九九三年爲其最高點，之後則呈遞減之勢。但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則呈不同的態勢，是以逐漸增長的趨勢出現，九〇年代的後半期均維持在 400 億美元以上的水準。由於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的逐年增長，使得資金的到位率亦逐年增長，相較於一九九三年，簽訂協議的金額雖然最高，但資金到位率只有 25 % 左右，一九九九年的協議金額雖然減少，但資金到位率卻能高達 97.8 %。資金到位率的增加，有助於大陸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吸收與利用。至於合同項目的平均規模，九〇年代後半期有明顯擴大之勢，幾乎成爲之前的兩倍。

註⑥ Gillis, Perkins, Roemer, Sn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92), p. 389.

表二 一九七九~一九九九年大陸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

年 份	項目數 (個)	協議金額 (億美元)	項目平均額 (萬美元)	實際利用金額 (億美元)	資金到位率 (%)	人均 GNP (美元)
1979-1983	1392	77.42	—	18.02	23.28	—
1984	1856	26.51	142.83	12.58	47.45	297.00
1985	3073	59.32	193.04	16.61	28.00	290.14
1986	1498	28.34	189.19	18.74	66.13	277.10
1987	2233	37.09	166.10	23.14	62.39	296.77
1988	5945	52.97	89.10	31.94	60.30	364.25
1989	5779	56.00	96.90	33.93	60.59	401.06
1990	7273	65.96	90.69	34.87	52.87	341.84
1991	12978	119.77	92.29	43.66	36.45	353.20
1992	48764	581.24	119.19	110.07	18.94	415.06
1993	83437	1,114.36	133.56	275.15	24.69	510.24
1994	47549	826.80	173.88	337.67	40.84	455.10
1995	37011	912.82	246.63	375.21	41.10	581.32
1996	24556	732.76	298.40	417.26	56.94	671.00
1997	21001	510.04	242.86	452.26	88.67	730.16
1998	19799	521.02	263.15	454.63	87.26	761.71
1999	16918	412.23	243.66	403.19	97.81	789.13
合計	324144	6134.65	189.26	3058.93	49.86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二〇〇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

在檢驗 FDI 在大陸經濟發展上所產生的效應之前，有必要先觀察這二十年來 FDI 在大陸的發展及特色，並探究大陸當局如何去規範並引導 FDI 的發展。劃分階段的方式很多，本節是以 FDI 協議金額的成長率為指標，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中共開放之後至一九八五年的外資進入的萌芽期，第二個階段為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外資進入的起飛期，第三個階段為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外資在大陸的高度成長期，第四個階段為一九九五年以後的利用外資的調整期。本節擬分階段探討大陸的外資政策及外資在大陸的發展，試圖檢驗二者的相關性。

（一）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的萌芽期

一九七八年底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從以往排斥外資轉而歡迎外資。為了建設一個對外資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必須在法律層面加以規範，於一九七九年七月頒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明文規定允許外商在大陸以合資、

合作及獨資的方式投資設廠，從此，「三資企業」便成為在大陸最主要的投資方式。一九八三年公布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規範了企業的設立、出資的方式、董事會與經理管理機構、經營期限、稅務與外匯管理等事項，並確立外資企業可以投入的行業。

除了法律明訂的產權形式之外，中共亦陸續開放四個經濟特區、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及經濟技術開發區，其意在主動提供區位優勢、土地的資源及許多的優惠措施，如減徵土地使用費、稅收、勞務費的優惠減免，並保障企業享有獨立的經營自主權。種種措施，無非是為了迎合外資企業追求壟斷性利潤的對外投資動機，以吸引外資的進入。

由於外資企業對這個初開放的環境認識不足，故在此時期，外資的進入多屬試探性的，投資的項目數不多，規模大小不一，平均規模並不太小，不過投資的產業多偏向於投資風險小的、回收快的產業，如輕紡工業或房地產、旅遊等第三產業。外資投資方式的結構，起初是以合作企業（由中方出土地、資源、廠房、設備等，外商出資金、技術和設備）佔市場的份額為最多，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在外資企業對大陸不熟悉的情形下，以合作的方式最符合外資企業的比較利益。但至一九八五年時，合資企業（中外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的市場份額已直逼合作企業，其比為49.24：49.66（見表三）。而獨資企業所佔的比例極微。在外資的來源方面，主要是以港澳地區為主，其他的開發國家則以美國為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進入很少。由於沿海港口城市的開放，使得資金的流入集中於東部的廣東、福建及沿海開放城市，進入大陸內部的資金很少。

此時期，大陸從閉鎖到開放，境內的經濟水平低（人均 GDP 只有 290 美元左右），投資環境不很理想，在利用外資方面尚處於起步摸索階段，許多優惠外資政策的頒布與執行，造就了外國直接投資在大陸發展的萌芽階段。

（二）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的起飛期

一九八六年大陸全面壓抑通貨膨脹，放慢經濟改革步伐，使得外資的進入受到影響，出現了首次的衰退。但在對外開放方面卻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動，使得外資隨後又出現復甦，即使是一九八九年出現六四天安門事件，外資進入大陸也只是出現停滯而未見衰退。這段時間進入大陸的外資數目較多，但金額較小，顯示國外大型跨國企業進入的仍不多，多為中小企業進入，利用大陸廉價的生產要素（人工及土地），以出口為投資的主要目標。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小型外資，在大陸經營最大的問題是外匯平衡的問題，因此在一九八八年間，大陸設立「全國外匯調劑中心」，准許外資企業進入該中心，與其他企業相互調劑外匯餘缺，以解決外資企業資金調配的需求。

在產業導向方面，大陸開始鼓勵外資企業進入其供給不足的能源、交通運輸及原材料等行業，八十年代末所推動的工業改革，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市場化，亦有利於外資企業進行中長期的工業投資。加上大陸的投資環境在基礎設施、科技條件及工業配套設施，均較前具規模，有利於吸收較大規模的工業投資，故此時吸收了若干美

國、日本、歐盟等國的企業，其中亦有稍具規模的工業投資，而使外商對大陸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從原本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結構，轉變為以第二產業為主，其市場份額陡增，甚至高達百分之七、八十，而第三產業的投資驟減，市場的份額只佔百分之十五左右（見表五）。

表三 三資企業的投資結構

金額：億美元，%

	合資企業			合作企業		獨資企業	
	實投額	實投額	份額	實投額	份額	實投額	份額
1979~82	6.73	1.04	15.45	5.30	78.75	0.39	5.79
1983	3.44	0.74	21.51	2.27	65.99	0.43	12.50
1984	7.35	2.55	34.69	4.65	63.27	0.15	2.04
1985	11.78	5.80	49.24	5.85	49.66	0.13	1.10
1986	16.15	8.04	49.78	7.94	49.16	0.16	0.99
1987	21.30	14.86	69.77	6.20	29.11	0.25	1.17
1988	29.81	19.75	66.25	7.79	26.13	2.26	7.58
1989	49.25	23.99	48.71	12.39	25.16	12.87	26.13
1990	32.42	18.86	58.17	6.73	20.76	6.83	21.07
1991	41.97	22.99	54.78	7.63	18.18	11.35	27.04
1992	107.57	61.15	56.85	21.22	19.73	25.20	23.43
1993	253.35	147.30	58.14	43.63	17.22	62.42	24.64
1994	330.89	179.33	54.20	71.20	21.52	80.36	24.29
1995	369.31	190.78	51.66	75.36	20.41	103.17	27.94
1996	414.70	207.55	50.05	81.09	19.55	126.06	30.40
1997	446.13	194.95	43.70	89.30	20.02	161.88	36.29
1998	454.63	183.48	40.36	97.2	21.38	164.7	36.23
1999	403.19	158.27	39.25	82.34	20.42	155.45	38.56
合計	2999.97	1441.43	48.05	628.09	20.94	914.06	30.4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二〇〇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九～二〇〇〇年）。

在法制規範方面，大陸仍繼續努力，如一九八六年頒佈了「外資企業法」，允許外資可以獨資經營，此法令的頒佈，使得外商的投資結構改變，獨資企業在市場的份額，從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見表三）；一九八八年公布的「鼓勵台商投資規定」及一九九〇年公布的「關於鼓勵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投資的規定」，吸引了港澳台企業的進入。一九九〇年頒佈的「外資法」修正條文，明確表明國家對合營企業不實行國有化的徵收，若有特殊情況，亦將給予相應的補償。甚至把原來規定董事

長職務，必須由中方擔任的條款，更改為由出資者雙方協商。此外，亦設立仲裁機構，以解決合資雙方可能會產生的爭議。這些制度的改革，為外資企業的進入與經營，孕育較為有利的宏觀環境。

此階段是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大陸當局對外資企業投資的領域放寬並作產業引導，對宏觀的投資環境、法律規範繼續改善，甚至更加開放投資的區域，如一九八八年將沿海開放區擴展到北方的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及其他沿海地區的市、縣，批准海南建省並設立海南經濟特區，一九九〇年決定開發上海浦東新區等。這些外資政策執行的效果，表現在資金到位率的成長，高達百分之六十左右，相較於前一時期，有明顯的成長（見表二），亦為外資進一步的成長作預備。只是外資企業集聚東部的沿海地區（高達 93.87 %，見表四），為大陸日後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擴大，預留了伏筆。

表四 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結構

年份	實際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份額（%）		
	東部	中部	西部	東部	中部	西部
1987	1294.16	38.93	116.56	89.27	2.69	8.04
1988	2298.36	167.07	186.91	86.65	6.30	7.05
1989	2816.88	117.51	122.06	92.16	3.84	3.99
1990	2974.10	122.60	71.71	93.87	3.87	2.26
1991	3889.49	168.46	67.61	94.28	4.08	1.64
1992	9802.41	725.82	194.85	91.41	6.77	1.82
1993	23690.69	2380.97	1014.16	87.47	8.79	3.74
1994	29087.23	2599.34	1401.76	87.91	7.86	4.24
1995	32463.51	3324.27	1142.55	87.90	9.00	3.09
1996	36538.15	3924.17	1007.75	88.11	9.46	2.43
1997	39917.06	4794.01	1167.39	87.01	10.45	2.54
1998	41334.17	4420.22	942.48	88.52	9.47	2.02
1999	36491.31	3821.67	898.74	88.55	9.27	2.1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各期。

(三) 一九九一～一九九四年的高度成長期

此時期外資進入的表現，進入了高度的成長，投資的項目數進入了五位數字，協議金額於一九九一年增至百億美元，一九九三年更高達千億美元，雖然一九九四年時，外資簽訂合同的項目數減縮，協議合同的金額亦減少 200 億美元，但金額仍為 826 億美元，遠遠超過前面兩個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則是呈逐年緩步增長的態勢，一九九一年大陸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為 43.66 億，至一九九四年時則達

337.67 億美元，為前一階段的十倍，足見外資進入大陸且被實際利用的成長是非常大的。項目的平均額亦在逐漸的擴大，一九九四年的平均規模幾乎為一九九一年的二倍（見表二）。一九九四年增長速度的縮減，應與大陸稅制的改革有關，因外資企業不再享有超國民待遇，改享國民待遇，優惠的減少略為降低了外資企業進入的動機。

外資進入的高度成長與大陸的政經環境有關。此時期是中國大陸的體制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中確認，加速改革、對外開放的方針，亦在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更加確立，外商投資的領域更為擴大。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影響國家傳統出口產品和外國政府有進口配額限制的相關產業不得投資外，外商均可投資。大陸當局並逐步開放金融、商業等行業，如外商可在城市合資或合作經營超級市場；在沿海開放城市可以舉辦外商投資銀行；在批准的旅遊渡假區內，開發旅遊設施；並可經營高速公路、鐵路、汽車運輸、碼頭建設等行業。投資領域擴大的政策，使得外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結構有了改變，在一九九一年時，原本外資企業在第二產業的投資，佔了 81.46 % 的市場份額，至一九九四年時，下降至 55.99 %，而第三產業從 16.7 % 再度躍升到 42.83 %（見表五）。

表五 外商在大陸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

單位：%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1985	1.99	39.74	58.27
1986	2.20	29.56	68.24
1987	3.37	49.35	47.28
1988	3.94	78.16	17.90
1989	2.17	84.48	13.35
1990	1.63	76.71	21.66
1991	1.84	81.46	16.70
1992	1.17	59.37	39.47
1993	1.07	49.40	49.53
1994	1.18	55.99	42.83
1995	1.90	69.64	28.46
1996	1.46	72.12	26.42
1997	1.92	62.40	35.67
1998	2.31	67.94	29.75
1999	3.57	68.86	27.57

註：本表是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來計算的產業份額，其中第一產業是指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和漁業）；第二產業為工業（包括採掘業、製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第三產業是指除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各業（包括流通部門、生產和生活服務部門、教育文化藝術部門、社會公共服務部門）。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一九九五），中國統計年鑑（一九八五～二〇〇〇）。

除了投資的領域擴大之外，開放的地域亦加以擴大，大陸先後開放了邊境對外開放城市和長江沿岸城市，進一步開放了國內的市場，並引導鼓勵外商向內地投資，不限制其股權比例、投資期限、且可以作資本投資。這些政策企圖使外資企業地區分佈合理化而提供積極的誘因，以期能縮減東、西部發展的差距，政策執行的效果是使此時期東部集聚的比重由一九九一年的 94.28 % 降至一九九四年的 87.91 %，中部地區的比重由一九九一年的 4.08 % 增至 7.86 %，西部的比重由 1.64 % 增加至 4.24 %（見表四），可見此時期區域政策的引導效果，略收成效。

由於一九九三年外資企業的大舉進入，逐漸地威脅到本地企業的獲利，甚至產生了壟斷或控制的情勢，引起學者及政府官員的高度關切，故有學者提出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且有許多的討論。為了符合國家的經濟安全，大陸的外資利用政策，不再一味地以優惠政策來吸引，而是進入引導外資企業，以符合大陸本身的產業政策。大陸本身宏觀的政經環境，中共當局亦繼續進行改革，故有一九九四年五大體制改革（財政、金融、稅收、外匯、外貿等體制）的提出，其中以外匯管理的改革與稅制改革對外商較有影響。因為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範的外匯市場的建立，使人民幣匯率單一化，逐步成為可兌換的貨幣，使外商投資時，資金的調度比以前靈活，符合外商企業的意願。稅制改革方面，大陸對外資企業不再課徵工商統一稅、產品稅，改徵與內資企業相同的增值稅、消費稅與營業稅，而且除另有規定外，稅率一律 17 %，與內資企業無異。至此，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已不再存在了。

本階段的外資政策，承續了上階段的整理，繼而全面開放、再轉為引導規範，使得外資的進入從起飛到高度成長，但因成長過速，造成經濟安全的疑慮時，仍由政策的調整使其發展的速度受到控制，而外資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亦隨外資政策的導引而有調整。此時期外資投資的方式，仍以合資企業為主，佔 55 % 左右，獨資企業為次，約佔 25 %，合作企業再次之，佔 18 %（見表三）。

（四）一九九五年迄今的調整期

自一九九五年始，大陸利用外資政策進入了調整期，其政策重點從數量的追求轉而要求注重質量、效益和結構的轉變。為符合其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的要求，一九九五年六月所頒佈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以及「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便具體地將外資的投資產業項目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四類。其鼓勵的項目，包括：一、農業新技術之開發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業建設的項目；二、高新技術、先進技術或能改進產品性能、節約能源的項目；或是大陸國內生產能力不足的新設備、新材料項目；三、能適應國際市場需求、提高產品品質、開拓新市場、增加出口的項目；四、綜合利用資源和再生資源以及防治污染的新技術、新設備項目；五、能發揮中西部地區的人力和資源優勢，且符合中共產業政策的項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又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修訂。從上述大陸當局所規劃的鼓勵項目來看，可見其對高新技術需求之孔急，且對中西部的開發，提出梯度開發的口號，並作出優惠政策的部署。至於那些大陸已開發的項目、實行專賣的項目、稀有貴重的礦產資源

及需要政府統籌規劃的產業項目，則在其限制之列。

此階段的外資政策，造成了投資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的改變。在投資方式方面，因為擁有高新技術的企業，多以獨資的方式進入，使得獨資企業在市場的比重，比前期增加許多，合資的方式明顯減少（見表三）。區域的結構因梯度開發的政策而略有改變，外商投資在中部的比重略有增加（見表四）。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亦有改變，包含高新技術第二產業再次成為主要的角色，市場份額再度躍升為 65 % 左右，第三產業投資的比重下降至 30 % 左右，因鼓勵外資企業從事第一產業的技術改造，其投資比重於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時略有提升（見表五）。

因為外資政策已從數量的要求轉為質量的要求，監管的工作勢必展開。例如，中共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間在廣東、浙江等地開始，實施銀行保證金臺帳制度，企圖對加工貿易的企業進行監管，以遏止加工貿易企業的原料走私活動。另外，大陸亦努力在改革其進口關稅制度，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取消進口稅收的減免優惠，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內的機器設備進口免稅優惠，為避免政策改變過大，其免稅寬限期可延至一九九七年底。正因稅收的優惠減少，加上當時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使得外商的協議金額急速減少，簽訂合同的項目數亦降低，顯示外資企業前往大陸的投資意願降低。此法令在一九九八年一月時略作修改，對國家鼓勵和支持發展的外商投資項目，再度實施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以期能刺激外資企業的進入。此舉雖使一九九八年的協議金額及實際利用金額略有提升，但至一九九九年，外資簽訂的合同金額與實際利用的金額仍是減少了。另以項目的平均金額來論，改革開放初期，多是以港澳地區的中小企業為主，但在此階段，由於歐美大國跨國公司的陸續進入，使得平均規模較前階段為大（見表二）。

至於資金的兌換方面，一九九六年時先嘗試將外商企業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實施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可兌換業務，至此，外資企業亦如同國內企業一樣，只需顯示有效的商業單據和憑證，即可到指定的銀行或從企業本身的外匯帳戶中兌付。外商企業可以開立外匯帳戶，保留一定數量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亦可到外匯調劑市場買賣外匯。但因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為維持人民幣的穩定，大陸實施外匯管制，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起，全面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所有需要外匯的三資企業都必須到指定的銀行去購匯，而銀行出售外匯給本國企業或外資企業時，事先必須獲得央行的批准。此舉乃為中共整頓其外匯交易行動的一部份，但對大陸的外商企業卻造成資金流動的不便。

綜觀一九九五年以後外資進入的金額，由於外資政策的調整而減少。外資的協議金額，從一九九五年的 912.82 億美元，逐年下降，一九九九年時僅為 412.38 億美元。不過由於大陸的投資環境日趨開放與法律化，使得實際被利用的金額仍維持在 400 億美元以上，均比前三個時期為高。進入二〇〇〇年以後，大陸的外資政策仍陸續出籠，如鼓勵外商將盈餘轉投資（外商以本身利潤轉投資在屬於鼓勵或允許類的行業時，可比照大陸本地居民成立內資公司的程序進行申請，不必循原外資管理機關的審批手續進行），西部大開發政策（訂定若干優惠政策以引導外資企業進駐西部，以期平衡地

區分佈的合理化，並符合其國家利益）等。由於外資政策規範日趨合理，亦因其正預備加入 WTO，給予外商許多想像空間，期盼大陸內部的政策規範可與國際的規範接軌，因此二〇〇〇年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比一九九九年增加許多，簽訂合同的項目為 22,532 個，比一九九九年增加 31.76%，協議的金額為 626.57 億美元，比一九九九年增加 50.84%^⑦，合同數目的增加及協議金額的增加，其效應將會在日後陸續呈現。

(五) 小 結

外國直接投資進入的動機與效果，與東道國本身的國情、資源秉賦、發展目標及政策執行的有效性有關。若綜合地來看外資的進入與中國大陸的外資利用的四個發展階段，在八十年代時，由於大陸市場屬開放之初期，以港澳中小型企業為主的外資企業，因擁有文化相近的優勢，是以獲取大陸便宜的生產要素（勞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為其主要的進入動機。而大陸以優惠政策為其利用外資政策的主軸，逐漸開放市場，吸收外資來填補其資金的缺口，滿足其經濟發展的需求。經過八十年代宗主國與東道國互動的學習與經驗的累積，為九十年代跨國公司的進入，奠定了基礎。九十年代，由於企業的經濟行為日益全球化，經濟增長所需的技術管理等關鍵要素更具流動性，而開發國家經濟結構日益趨同，使得跨國公司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加劇，必須進入這個具有市場雛形的大陸市場，並作全球化資源的佈局，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競爭力，以期獲取生產過程專業化的優勢（鄧寧所謂的效率導向），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歐美大型的跨國公司，雖不具備文化相近的優勢，但因其擁有技術管理的商業資本，仍受大陸當局的歡迎。隨著大陸法制規範的逐漸設立，及在利用外資政策上的學習（包括如何制訂及調整外資政策，以配合其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的目標），使外國直接投資的資金到位率在九十年代呈現直線上升的局面。

四、外國直接投資對大陸經濟發展的效應

開發中國家願意引進外資的原因，有其資本形成、貿易層面、技術層面、創造就業及制度改革需要等。就中國大陸而言，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後，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正面的效益，也帶來了相關的問題，將分述於後。

(一) 資本效益

根據 Harrod、Domar 的經濟成長模型，資本的累積是決定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落後國家由於所得水準低下，導致儲蓄不足，無法支應投資所需，若能藉由吸收外國的資金（在不替代國內的儲蓄和投資的前提下），來增加資本形成的比率，對經濟成長將有極大的助益。因為資本的增加，將使勞動的資本設備增加，進而增加勞工的生產力。或者，外資企業比國內企業更具資本密集性和技術密集性，勞動生產率較高，有助於東道國投資效率的提升，因此，東道國願意接受外國在其境內的直接

註⑦ 中國經濟新聞，第五期，二〇〇一年二月五日，頁二三。

投資。以此理論來檢驗大陸的發展經驗時，發現外資的進入確實帶來了若干的資本效益，由圖一所呈現的 FDI 的成長與 GDP 的成長、固定資產投資的成長均成同樣走勢之發展，可見三者相關性很高。

圖一 FDI, GDP 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成長關係

由於 FDI 的進入，帶來了資金、技術，甚至是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將使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並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我們先檢驗大陸 FDI 的成長與 GDP 成長的關係。表六中可見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九年 FDI 佔 GDP 比重的逐年變化，一九九四年的比重為最高，高達 6.22 %，之後逐年遞減。比較起來，九〇年代 FDI 佔 GDP 的比重要高於八〇年代，可見九〇年代 FDI 帶動 GDP 成長的角色已較為重要。若要檢測一九八四～一九九九年的整體趨勢，所作的單元回歸公式如下：

$$\log \text{GDP}_i = a + b \log \text{FDI}_i \quad i = 1984 \sim 1999 \quad \dots\dots(1)$$

$\log \text{GDP}$ 為 GDP 的成長率， $\log \text{FDI}$ 為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的成長率。所測得二者的相關係數為 98.53 %，顯示出 FDI 的成長與 GDP 的成長，二者存在著極顯著的相關關係。另就上述的回歸式，所求得 $\log \text{FDI}$ 單元回歸的係數 b 為 0.45^③，意謂著當 FDI 成長率增加 1 % 時，其可帶動 GDP 成長率增加 0.45 %。

註③ 此係數是用 OLS (普通最小平方法) 估計而得，此係數估計值的標準差為 0.0211， t 的檢定值為 21.54，達 99 % 的顯著水準。

表六 外商直接投資 (FDI) 占固定資產形成 (FAI) 和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比重

年份	FAI (億元)	GDP (億元)	美元平均匯價 (人民幣)	FDI/GDP (%)	FDI*/FAI (%)	三資企業工業增加值/ 全國工業增加值 (%)
1984	1,832.9	7,171.0	2.33	0.41	1.12	0.86
1985	2,543.2	8,964.4	2.94	0.54	1.34	1.09
1986	3,120.6	10,202.2	3.45	0.63	1.45	1.27
1987	3,791.7	11,962.5	3.72	0.72	1.59	1.83
1988	4,753.8	14,928.3	3.72	0.80	1.75	2.40
1989	4,410.4	16,909.2	3.77	0.76	2.03	3.16
1990	4,517.0	18,547.9	4.78	0.90	2.58	3.95
1991	5,594.5	21,617.8	5.32	1.07	2.91	5.83
1992	8,080.1	26,638.1	5.51	2.28	5.25	7.42
1993	13,072.3	34,634.4	5.76	4.58	8.49	8.42
1994	17,042.1	46,759.4	8.62	6.22	11.96	11.16
1995	20,019.3	58,478.1	8.35	5.36	10.95	16.74
1996	22,913.5	67,885.0	8.31	5.11	10.59	15.86
1997	24,941.1	74,463.0	8.29	5.04	10.53	17.86
1998	28406.2	78345	8.28	4.80	9.28	20.88
1999	29854.7	81911	8.28	4.08	7.83	22.49

註：FAI 是指全大陸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據王洛林的估算，外商大約把 70% 的投資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因此 FDI* 值的計算是以外商實際投資額的 70% 來計算的。一九八四~一九九一年因無三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表中是以其他經濟類型的工業淨產值代替，並與全國工業的淨產值相比較。見王洛林編，**中國外商投資報告**，一九九七年，頁四，及**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二〇〇〇）。

論到外商直接投資中，其在固定資產設備的投資佔全大陸的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在一九八四年時，其比重只佔 1.12%，之後，比重逐漸上升，於一九九二、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比重快速增加，於一九九四年達到最高，比重高達 11.96%，之後逐漸遞減，一九九七年時，比重達 10.53%，一九九八年減少至 9.28%，一九九九年降至 7.83%（見表六）。

雖然 FDI 在 GDP 及固定資產形成的比重在一九九四年之後漸減，卻不盡然意謂著外資企業資本形成效益的遞減。若從三資企業（工業）的增加值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來觀察資本效益時，吾人卻發現其數值是增加的（見表六）。其顯示三資企業（工業）的產出貢獻在全國工業的產出績效的比重是增加的，顯見其資本效益是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減少，但資本效益卻增加，突顯出外商企業的投資結構已有改變，其投資有逐漸傾向於低投入但投資於附加價值高的產業。在黃華民的實證研究中，亦證明了一九八四~一九九八年間，外商的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資本形成率，而且提高了資

本形成的效率^⑨。

(二) 貿易效益

一般來說，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進出口貿易的效益最明顯的是影響貿易的規模、績效與結構。先就貿易規模來說，出口導向型的外商，可因其擁有的品牌聲譽或銷售網絡，幫助東道國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又因其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加工工藝，提高東道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增加直接出口的規模。此外，亦將透過「產業後向關聯效應」帶動國內企業的間接出口，而使東道國的貿易規模擴大。再就貿易績效而論，由於貿易的增長，使外資企業對東道國進出口數量的貢獻率增加，而提高了貿易的效率。更因外資的進入，所帶動的貿易行為，有可能使東道國原本的貿易結構產生變化。

從大陸的實際經驗中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確實促進大陸貿易的發展，由其在世界貿易的排序從一九七八年的第32名，躍升為一九九九年的第9名便可知。整體來說，FDI與大陸的貿易規模間的關係，在一九八〇～一九九七年間，FDI對大陸的出口貿易規模的成長具有顯著性作用^⑩。若再細部分析，表七說明了外資企業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九年間的每一年的貿易狀況。在出口的規模方面，外資企業的出口金額從一九八〇年的0.08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886.28億美元，增加的規模不可謂不大。外資企業出口的金額佔全大陸企業出口金額的比重，亦是越來越大，八十年代時，僅維持個位數字的百分比，進入九十年代後，由一九九〇年的12.58%升到一九九九年的45.47%，而且外資企業出口的增長率大多比大陸企業出口的成長率高，使得外資企業成為大陸的重要出口部門，反應出外資企業出口創匯的能力。不過，九十年代外資企業本身的出口成長率是呈遞減的趨勢，尤其是在一九九八年，因受東亞金融風暴的影響，外資企業出口的成長率只有8.14%，但相較於大陸本地企業出口成長率，外資企業仍有較強的成長。

在進口方面，外資企業的進口金額由一九八〇年的0.34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858.84億美元。外資企業的進口佔全大陸企業進口比重，由一九八〇年的0.17%，竄升至一九九〇年的23.07%，至一九九八年更是高達了54.74%，比重是呈直線上升的情勢，而且外資企業進口的成長率一直是高於大陸本地企業（一九九九年形勢有改變），顯示出外資企業亦為大陸最大宗的進口部門。不過，自一九九三年以後，外資企業進口的成長率減少，至一九九七年只成長2.79%，一九九八年甚至呈現負成長的局面。進口的減少，足見外資企業原本依賴進口的中間財及設備，已可由當地採購獲得，反映大陸相關支援產業已逐漸養成，亦顯示進口替代的效果已發酵。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九年外資企業進口的成長率低於大陸本地的企業，比重稍有下降，與大陸逐漸對外商開放內銷市場有關，可預見的是，產業關聯的效應將會擴大，外資企業的少進口，多出口，所形成的貿易順差亦將收到改善外匯收支的效果。

註⑨ 黃華民，「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經濟評論*，二〇〇〇年第六期，頁三〇。

註⑩ 謝冰，「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及其實證分析」，*經濟評論*，二〇〇〇年第四期，頁三二。

表七 外資企業的進出口與全大陸進出口的比較（1980~1999）

年份	出口					進口				
	外資企業出口		全大陸出口		比重 (%)	外資企業進口		全大陸進口		比重 (%)
	金額 (億美元)	增長率 (%)	金額 (億美元)	增長率 (%)		金額 (億美元)	增長率 (%)	金額 (億美元)	增長率 (%)	
1980	0.08	-	181.2	-	0.04	0.34	-	200.2	-	0.17
1981	0.32	300	220.1	21.47	0.15	1.11	226.47	220.1	9.94	0.50
1982	0.63	96.88	223.2	1.41	0.28	2.76	148.65	192.8	-12.4	1.43
1983	3.3	423.81	222.2	-0.45	1.49	2.88	4.35	213.9	10.94	1.35
1984	0.7	-78.79	261.4	17.64	0.27	4	38.89	274.1	28.14	1.46
1985	3.0	328.57	273.5	4.63	1.10	20.6	415	422.5	54.14	4.88
1986	5.8	93.33	309.4	13.13	1.87	24.3	17.96	429.1	1.56	5.66
1987	12.1	108.62	394.4	27.47	3.07	31.2	28.40	432.1	0.70	7.22
1988	24.6	103.31	475.2	20.49	5.18	57.5	84.29	552.7	27.91	10.40
1989	49.1	99.59	525.4	10.56	9.35	88	53.04	591.4	7.0	14.88
1990	78.1	59.06	620.9	18.18	12.58	123.1	39.89	533.5	-9.79	23.07
1991	120.5	54.29	718.4	15.70	16.77	169.1	37.37	637.9	19.57	26.51
1992	173.6	44.07	849.4	18.23	20.42	263.7	55.94	805.9	26.34	32.72
1993	252.4	45.39	917.4	8.01	27.51	418.3	58.63	1039.6	29.0	40.24
1994	347.1	37.52	1210.1	31.91	28.68	529.3	26.54	1156.1	11.21	45.78
1995	468.8	35.06	1487.8	22.95	31.51	629.4	18.91	1320.8	14.25	47.65
1996	615.1	31.21	1510.5	1.53	40.72	756.1	20.13	1388.3	5.11	54.46
1997	749	21.77	1827.9	20.95	41	777.2	2.79	1423.6	2.54	54.59
1998	810	8.14	1838.1	7.97	44.1	767.2	-1.29	1402.4	-1.54	54.74
1999	886.28	9.42	1949.3	6.05	45.47	858.84	11.94	1657.0	18.15	51.8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四~二〇〇〇。

若以外資的進出口總金額與全大陸的進出口總金額來比較（見表八），外資企業所佔的比重亦是直線上升，從一九八一年的 0.32%，擴張至一九九九年的 48.39%，外資企業所帶動的進出口幾佔全大陸進出口的一半。外資企業進出口的增長率大部份的年份都比大陸企業的增長率高。再檢驗外資企業在大陸進出口數量的貢獻率時，自一九八九年以後，外資企業的貢獻率是相當驚人的，如一九九〇年的 170.48%，一九九六年的 302.66%，顯見外資企業不但帶動大陸進出口的成長，並且還彌補了內資企業進出口的不振，否則根本無法促成大陸進出口的成長。

表八 一九八一～一九九九年外商企業進出口貿易績效之分析

項目 年份	全國進出口 總額 (億美元)	外企進出口 總額 (億美元)	外企佔全國 總額比重 (%)	全國進出口 總額增長率 (%)	外企進出口 總額增長率 (%)	外資企業貢 獻率 (%)	對外依存度 (%)
1981	440.2	1.43	0.32	15.42	240.48	1.72	15.12
1982	416	3.39	0.81	-5.50	137.06	-8.10	14.57
1983	436.1	6.18	1.42	4.83	82.30	13.88	14.49
1984	535.5	4.7	0.88	22.79	-23.95	-1.49	16.75
1985	696	23.6	3.39	29.97	402.13	11.78	23.05
1986	738.5	30.1	4.08	6.11	27.54	15.29	25.29
1987	826.5	43.3	5.24	11.92	43.85	15.00	25.78
1988	1027.9	82.1	7.99	24.37	89.61	19.27	25.60
1989	1116.8	137.1	12.28	8.65	66.99	61.87	24.58
1990	1154.4	201.2	17.43	3.37	46.75	170.48	29.98
1991	1356.3	289.6	21.35	17.49	43.94	43.78	33.43
1992	1655.3	437.3	26.42	22.05	51.00	49.40	34.24
1993	1957	670.7	34.27	18.23	53.37	77.36	32.54
1994	2366.2	876.4	37.04	20.91	30.67	50.27	43.59
1995	2808.6	1098.2	39.10	18.70	25.31	50.14	40.19
1996	2898.8	1371.2	47.30	3.21	24.86	302.66	35.55
1997	3251.5	1526.2	46.94	12.17	11.30	43.95	36.22
1998	3240.5	1577.2	48.67	-0.34	3.34	-463.64	34.28
1999	3606.3	1745.12	48.39	11.29	10.65	45.90	36.50

註：外資企業貢獻率 = (外資企業進出口增長量 / 全國進出口增長量) × 100%

對外依存度 = (進出口總額 / GDP) × 100%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鑑計算而得。

在貿易結構的轉變方面，FDI 帶動貿易量的增加，也使大陸貿易的結構有變化。由八〇年代初級品為主、工業製成品為次，服務貿易比重極低的出口貿易結構，轉變為九〇年代以工業製成品為主、服務貿易為次、初級產品比重為最少的結構。事實上，此貿易結構的轉變與三資企業的產業結構的變遷是相呼應的，正因三資企業在第二產業所佔的比重漸增，並帶動工業製成品的出口。第三產業的變化亦然。又因外資企業流入第二產業的增加，其出口導向的特質是將生產的「兩頭」定在國際市場，造成原材料進口的增加，一部份原需進口的工業製成品實行替代，而使得進口貿易的結構也產生改變，由一九八五年初級品進口比重佔 12.52% 上升到一九九八年的 16.37%，

而工業製成品進口的比重，由一九八五年的 87.48 % 下降至 83.63 %。總之，FDI 的進入，影響了大陸貿易結構的改變。

(三) 技術效益

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論，期待吸收已開發國家的技術，以提高本國的技術進步，常是其願意引進外資的第一目的。根據聯合國一九九二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曾有如此論述：外資對東道國技術進步的直接作用是，它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果 (spill-over effect) 提高東道國要素生產率，改變產品結構，促進研究與開發，引起組織創新，提高管理水平等；間接作用則要通過與當地研究與開發機構合作，向當地前向或後向產業的合作者轉移技術，並為當地增加受訓人員的總數^①。學者亦以為，透過 FDI 所帶來外資企業內部的技術擴散，與前向與後向關聯產業的技術外溢，可造成整個產業的升級。若將技術轉讓的內容與特性分為生產硬件、組織硬件、中介性生產技術、中介性組織技術、生產軟件及組織軟件六大層次，從外商獲得硬體設備的技術要比軟體技術容易，因為透過合作關係即可獲取硬體設備的技術，但軟體技術卻需透過高的談判能力、企業的吸收能力，甚至要具備對生產和組織軟件的鑑賞力才得獲取^②。除了在東道國內的技術效應外，東道國甚至可藉由外資企業進入全球網路，並習得進入網路的技術。不過，東道國企業自身的能力、技術吸收的能力、談判的能力、對技術的鑑賞力正是技術轉讓效應及產業帶動效應的制約因素。

雖然評估大陸外資企業所帶來整體的、具體的技術效應，不是易事，但藉以下的說明，可發現外資的總體技術水平是較高的。首先，若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在九十年代的初期，大中型企業的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支出是呈上升的局面（見表九）。從這些支出的增加，間接可推估外資技術的引進是逐年增加的。

其次，若從個別行業來看，外資在電子行業所帶動的技術進步的效益最為明顯。表十可看出，每個國內電子企業的主要設備擁有總量，要比外資企業多 44.99 %（194 台：133.8 台），但進口設備、自動生產線及計算機的擁有量，外資企業卻為國內企業的 5.87 倍（59.66 條：10.16 條）、1.42 倍（1.73 台：1.22 台）和 1.95 倍（15.35 台：7.88 台）。由此可見，外資企業帶來比較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生產線，所帶來的示範效果，勢必將帶動技術溢出的效應。

表九 大中型企業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支出

單位：億美元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技術引進支出	90.23	116.06	192.84	275.7
消化吸收支出	4.06	5.4	8.71	9.7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六三。

註①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92).

註② 劉恩專，「外國直接投資產業帶動效應分析」，*財貿經濟*，一九九九年第十期，頁四四～四五。

表十 一九九五年國內和外商投資企業先進裝備擁有量比較表

項 目	主要設備擁有總量 (台)	90 年代以來進口 設備(條)	自動生產線擁有量 (台)	計算機擁有量 (台)
國內企業(2805 個)	544217	28498	3420	22112
外資企業(697 個)	93290	41584	1209	10704
國內企業平均	194	10.16	1.22	7.88
外資企業平均	133.8	59.66	1.73	15.35

資料來源：電子工業部（轉引自王洛林，中國外商投資報告，頁一三一）。

除了外資企業帶來的溢出效果，與外資合資的國內企業亦將獲得先進技術裝備及技術轉讓。據 Ping Lan 和 Stephen Yong (1996) 對大連合資企業中方經理人員的問卷調查（見表十一），有 26 % 的人以為獲得外資企業高級技術的轉讓，可助其縮短十年以上的技術差距；有 48 % 的人認為獲得了中級技術的轉讓，其可縮短十年以下的技術差距；另有 26 % 的人認為無實質性技術的轉讓。由此問卷調查，有 74 % 經理人員認為獲得了技術轉讓。

表十一 對外資技術轉讓先進程度的問卷調查

外資技術轉讓水平	樣本數	公司的回復	
		回復數	所佔比例(%)
高級技術轉讓	361	95	26
中級技術轉讓	361	173	48
無技術轉讓	361	93	26

資料來源：Ping Lan and Stephen You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North-East Chin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 5, no. 1, 1996 (April), p. 64.

(四) 就業效益

開發中國家的失業問題，常是其經濟發展的難題，藉由引進外國的直接投資，將會對就業市場造成直接與間接的效果。直接的效果表現在於雇用勞工人數的增加，直接創造了就業機會的增加。而間接的效果是指當外資進入後，會因帶動產業關聯性，引發工資的乘數效果，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例如，外資在當地增加採購原料、半成品或零組件時，會增加這些產業的生產，而增加這些產業僱用人數的增加；或當外資在當地增加銷售時，市場的行銷、運銷及維修等，也將帶來就業的機會。

從表十二外資在中國大陸所雇用的人數來看，可知外資在大陸創造就業效益的直接效果，不僅雇用的人數增加，而且外資企業雇用人數佔全大陸就業人口的比重亦在上升之中，不過比重並不高。雖然創造就業機會的效益不高，但若我們來比較三資企

業和大陸企業的勞動素質（每人每年所創造的工業總產值），則發現三資企業的勞工，每年所創造的產值是大陸勞工的數十倍，可見三資企業勞工的素質要遠高於大陸企業的勞工。不過，兩者的差距呈逐漸縮小之勢，顯見隨著外資企業的進入，對大陸勞工的勞動生產率有提升的效益。

表十二 三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就業情況之比較

	雇用人數（萬人）			勞動力素質（萬元年產值/人）		
	外資企業	大陸企業	比重（%）	三資企業	大陸企業	三資/大陸
1985	6	49873	0.01	19.57	0.19	100.45
1986	13	51282	0.03	12.54	0.22	57.46
1987	21	52783	0.04	13.27	0.26	50.73
1988	31	54334	0.06	15.98	0.34	47.64
1989	47	55329	0.08	16.14	0.40	40.55
1990	66	56740	0.12	13.22	0.42	31.34
1991	165	58360	0.28	9.33	0.46	20.45
1992	221	59432	0.37	11.43	0.58	19.64
1993	288	60220	0.48	17.62	0.80	21.92
1994	400	67199	0.60	23.59	1.04	22.59
1995	513	67947	0.76	20.88	1.35	15.44
1996	540	68850	0.78	22.17	1.45	15.33
1997	581	69600	0.84	24.52	1.63	15.00
1998	587	69957	0.84	32.54	1.70	19.12
1999	612	70586	0.87	30.97	1.79	17.33

註：勞動力素質＝每年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勞工人數。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一九九四、一九九九、二〇〇〇。

(五) 制度效益

開發中國家希望引進外資的原因，除了創造資產帶動的效應、達到產業結構的優化的目標、帶來賦稅的收入、提高人民的收入、提高產出、增加出口和就業、引進高新技術、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等等之外，更希望 FDI 會帶來制度的示範效果。因為外商企業與開發中國家企業的經濟行為之所以不同，是二者制度環境的不同所使然。藉由 FDI 帶來制度示範的效果，可讓東道國產生制度變遷的效應，縮短制度變遷中的時滯，減低制度變遷的成本等^③。

註^③ 李健，「轉軌經濟中外商直接投資制度效應的理論分析」，中國經濟問題，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頁三五～三六。

透過引進外資，對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的效應，不但表現在資本、貿易、技術及就業等方面，也反應在經濟結構、效率與經濟制度方面。在經濟結構、效率方面，有學者以實證方法驗證外商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對大陸的經濟結構資源配置的效率有影響力，例如：跨國公司多集中在生產率較高、人均利潤率、銷售利潤率較高、教育程度較高、新產品研發開支較高的行業，而且，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增加了行業間之收入不平均、利潤分布不平均、人均工資不平均等。因此學者以為跨國公司正在對大陸的經濟進行結構改造，而且主動權卻不完全掌握在大陸手中。跨國公司的進入被認為是使大陸的經濟結構邁向具有更高資源配置效率的轉化^⑭。

在經濟制度方面，大陸學者亦不諱言地承認外資企業促進大陸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國際化的貢獻^⑮。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外資企業引進了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帶動了國有企業的改革（或是透過嫁接改造的方式，直接地使國有企業轉換其經營體制；或是以其企業經營績效的示範，間接地使國有企業樂於轉換經營體制）；促進了經濟管理體制（包括價格管制體制、金融體制、財稅體制、投資體制、內外貿體制、外匯體制等）的改革。在經濟國際化方面，由於外資企業的外向型程度較高，其示範效果帶來了本土企業經營理念的改變，生產經營方式從國內擴展到國際，帶動了本土企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繫，並推動整個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向國際接軌的需求。

(六) 引進外資過程中引發的相關問題

自中共引進外資之後，雖然帶來正面的效應，但亦存在一些負面的效應。負效應的產生，主要與FDI在大陸發展的特色及大陸本身的政經環境有關，今分別說明如下：

在資本方面，雖然外商投資帶來資本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發展，但進入九〇年代以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增加，加上外資的金額亦同步增加，而國內銀行體系存在著巨額的存貸差，加上外匯存底的逐漸增加，造成國內資源處於閒置狀態，並導致大陸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壓力，此壓力增長到一定程度之時，便會引發國內需求膨脹，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故大陸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的通貨膨脹，學者以為外商資本大量的流入，是其主要的原因，是外資流入的負效應。

在貿易方面的負面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口來看，外商投資企業一直是進口額大於出口額，直到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情況才有改變，而外資企業進口額佔全大陸進口金額的比重，亦比外資企業出口佔全大陸出口金額的比重為高，甚至在一九九四年高出了17%，一九九五年高出了16.14%（根據表七計算而得）。這種進出口比例關係，對大陸國際收支的平衡帶來了壓力。進口增長的態勢，如長期得不到改善，將會增加市場的競爭。至一九九九年，二者的差距被控制在6.36%，稍為減輕平衡的壓力。二是從貿易的形式來看，表十三的資料顯示，國有企業主要承擔的是一般貿易，外商投資企業則主要從事加工貿易。自一九九五年起，整

註^⑭ 張帆、鄭京平，「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結構和效率的影響」，*經濟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四五～五二。

註^⑮ 王洛林、裴長洪、盧聖亮，「中國外商投資狀況與發展趨勢」，*財貿經濟*，一九九七年第十期，頁一九。

體企業的加工貿易比重超過一般貿易的比重，然個別型態的企業則有不同表現，其中以一九九七年外商投資企業的表現特別突出，其加工貿易出口比重超過其一般貿易的 73%，比國有企業加工貿易出口比重也多出 52.4%。進口的結構亦呈外商企業在加工貿易方面的強勢。

表十三 貿易方式的構成

單位：%

出口貿易	1990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整體	57.1	41.0	48.8	49.5	41.6	55.8	42.7	54.7
國有企業	63.5	34.6	61.5	31.0	62.4	34.8	64.0	33.3
外商企業	14.0	85.5	9.3	89.7	12.2	86.3	12.7	85.7
集體企業	—	—	53.6	41.6	52.0	43.3	52.2	39.1
其他	—	—	8.8	2.4	9.1	1.4	29.2	2.1

進口貿易	1990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	加工貿易
整體	49.1	35.2	38.2	44.2	28.3	44.9	27.3	51.0
國有企業	62.8	31.5	56.8	31.5	52.5	33.9	47.9	36.5
外商企業	8.1	48.9	8.4	58.9	9.1	54.9	11.1	63.8
集體企業	—	—	24.3	44.4	24.4	40.6	24.0	45.0
其他	—	—	24.0	—	42.7	—	16.0	0.4

資料來源：根據海關統計的數據計算，轉引自邢建國，*三資企業研究*（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五七。

加工貿易的主要特徵是以加工裝配和來料加工為主要形式，且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其出口額中所包含的進口比例相當高。當加工貿易過度擴張，必然會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效應：第一，由於加工出口貿易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類出口產品與大陸內資企業的產品出口結構基本雷同，當外資企業加工出口貿易份額擴大時，勢必意謂著對大陸內資企業出口配額的擠占。第二，加工貿易是一種「兩頭在外」的生產方式，這種方式容易使受資國成為外國資本所控制的「生產車間」，外商企業往往通過「兩頭控制」（即控制進口價格和出口價格）來從中謀取高額壟斷利潤。第三，一般情況下，加工貿易對出口國的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拉動作用，其原因主要在於這種出口方式依賴於國外的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市場，因而對國內產業的前向聯繫和後向聯繫的效應不大，難以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更因為加工貿易

的形式，使得大陸經濟對外的依存度（進出口總額/GDP）大幅提高（見表八），提高了萬一外商從國內抽離資金時面臨的風險。

在技術方面，似乎從外商企業轉讓和開發技術的狀況不盡令人滿意。有的雖然帶來了一些技術，但是，大多數是二流和三流的技術，很少將核心技術和關鍵工藝帶來。同時，大多數在大陸的投資項目的技術開發能力差，有的甚至沒有技術開發機構。外商企業是根據其全球戰略，往往願意將技術開發機構設在母公司，以便壟斷技術。即使某些合資企業的中方在合資前具備一定的技術開發能力，在合資後，其研究開發機構也大多被解散了。這種做法常使外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項目只是將其成型的產品拿來生產，大陸只是其生產加工基地，是其全球經營網絡中最簡單的加工組裝環節，要想獲得技術溢出的效應並不如預期，從長遠來看，對大陸的技術開發能力並無益。

在市場效應方面，外商企業雖帶來市場的機制，卻也出現搶奪大陸市場的情勢。他們憑著其在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在與大陸國有企業的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並不斷擴大其在大陸的市場佔有率，而國有企業則漸處弱勢。即使是原來的名牌產品，在競爭中也被擠得市場份額越來越小，有的甚至退出了市場。在外資企業的衝擊下，許多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因沒有銷路而面臨倒閉的危險，只得尋求與外資企業合資以作為走出困境的辦法。儘管外資企業在大陸的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還很小，但在一些新興產業和高利潤的行業，市場排擠的問題尤其突出。首先，外商投資企業在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技術領域的市場份額相當高。例如，在微電子行業，在大陸目前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8家企業中，中外合資企業5家，外商獨資企業1家，國有企業有2家。在5家中外合資企業中，只有1家由中方控股，其他4家均由外方控股^⑤。從產品檔次上，外資企業普遍高於國有企業。在一些高利潤的行業，外商在投資的選擇上，在產業上多選擇下游產業，在產品上多選擇最終產品，而把上游的基礎產業和中間產品留給國有企業，而使國有企業獲取利潤的空間縮小。

在經濟安全方面，當外商進入後，在某些行業或地區，出現了壟斷或控制的局面，其包括了大型企業控股的份額加大、企業的合併或品牌的收購與取代。尤其是大量的民族品牌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一些已有較高知名度的品牌也在逐漸退出市場，使得其感受到安全受威脅。例如，照相機行業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過多年的努力，大陸的照相機行業已經建立成了獨立的生產體系，並形成了海鷗、東方、鳳凰等國內名牌。但是，近幾年來，隨著外商企業對照相機行業投資的增加，使得大陸的照相機生產企業無力同它們競爭，大多數已經被擠垮，許多品牌逐步被擠出市場。這些威脅，來自於市場、來自於競爭，但卻影響著許多大陸企業的存續與發展，故引發大陸內部對經濟安全許多的討論。此討論甚至延續到目前，中共內部仍認為跨國公司是一把兩刃的利劍，因其會干涉東道國的自主權，會在貨幣政策、財務政策、銷售安排等方面具影響力，甚至控制開發中國家的產業和市場格局，直接危及其經濟命脈。會侵犯開發中國家的商業秘密、會與東道國進行人才搶奪，使開發中國家的人才被其吸

註^⑤ 盧聖亮，「關於外資結構的若干理論爭論」，載楊聖明編，*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三六四。

收，其強調的「對公司的忠誠」優先於「對國家的忠誠」，將導致被投資國國民國家忠誠度弱化^①等等。

在稅收方面，外商企業是否能為大陸創造大量的稅收，一直令人懷疑，因為外商企業逃稅、向國外轉移利潤的現象是事實。一些外商企業為了避稅，採用高報進口設備價格和進口原料價格、低報產品出口價格等方式向國外轉移利潤，實盈虛虧，例如，某製藥廠有限公司生產「腸蟲清」的主要原料「阿苯噻啉」在大陸內部許多藥廠都能生產，而且質量很好，每年都大量出口。僅陝西漢江製藥廠每年就出口幾十噸，出口價格為 39~40 美元/噸。但是該製藥公司以國產原料不合格為藉口，拒絕使用國產原料，而高價從其在墨西哥的子公司進口原料，每年大約進口 30 噸，進口價格為 240 美元/噸。僅此一項，該製藥公司每年就向外轉移利潤 240 萬美元^②。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通常由外商控制。它們通過壓低產品出口價格以實現利潤轉移更為普遍。這些行為，若基於外商企業的自利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使大陸從外商企業預期的稅收減少。

其他方面的問題，如外商投資來源地域過於集中，主要集中於港澳台等地，造成投資企業的型態相似，如中小資本居多，技術層次偏低，與大陸本身企業的技術水平同質性高，技術引進多是二流，不能滿足大陸經濟發展對高新技術需求的孔急。又如，外商投資結構不盡合理，因其投資多集中於工業，在工業的投資中，一般性加工工業項目多，農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項目少；初級加工、勞動密集型工業多，高新技術、技術密集型項目少；中小型項目多、大型項目少。外資企業在第三產業的投資，多集中於商業、飲食業、旅遊業、房地產等投資期短、回收快的項目，對於交通、通訊、科技等大陸急需發展的行業，投資相對較少。據宋泓、柴瑜的實證研究指出，三資企業並未改進大陸工業的總體效應，反而使其下降；三資企業在大陸工業部門中的分布，基本上是處於和大陸企業相競爭的替代狀態，而非相互分工合作的互補狀態^③。如此般的投資結構，不但不利於大陸的產業結構調整、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甚至有可能淪為西方國家的加工基地和消費市場的疑慮^④。再加上外商投資地域不均衡，外商企業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投資於東部地區，更是加大東西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大陸當局雖大力鼓勵西進，並提供優惠條件，但效果仍有待觀察。

五、結 論

總結大陸二十年來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經驗來論，其目標確實是為滿足其經濟成長過程中的資本需求、平衡其國際收支，並期望藉由外資企業的技術，來促進大陸企業的技術進步及制度改革的推展。綜觀大陸這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FDI 有其不可抹

註① 半月談，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日。

註② 袁文祺、盧聖亮，「價格轉移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隱憂」，財貿經濟，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註③ 宋泓、柴瑜，「三資企業對我國工業結構效益影響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頁三〇~三六。

註④ 李京文，「引進外資與我國經濟的發展」，財貿經濟，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頁五四。

殺的功勞。值得強調的是，在引進 FDI 的過程中，正負效應的調控，取決於外資政策的選擇與執行。政策雖有其滯後性，但總可以牽引行為者理性的經濟行為。大陸的利用外資政策，涉及了「國民待遇」與「超國民待遇」的選擇、外資規模的控管、稅率的制訂、優惠的多寡、開放地區的大小、投資領域的設限、法律條文的規範等等。政策的釐訂，是根據大陸本身的宏觀經濟情勢、產業的結構、法律的規範所訂的。總體來說，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所帶來的資本、貿易、技術、就業、制度等效益，應是被肯定的。但當外資的進入對內地的企業形成競爭的態勢，引起「經濟安全」的疑慮，或是有負面效應產生時，大陸則以其本國的產業政策為依歸，制定配套的利用外資政策，以使負面的效應能減至最低。因此，利用外資政策在 FDI 與大陸經濟發展之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二十年來，FDI 在大陸的特色，若以資金的來源地而言，是以港澳地區與台灣地區所佔的比例最高，日本為次，歐美國家雖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但對大陸投資佔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並不高。其原因除了文化差異大及地理距離遠之外，另有兩個經濟原因，一是因為大陸與港澳等亞洲國家產業的國際分工的差別較小，比較容易形成投資與受資的相互關係，比較優勢亦比較容易與生產環節相契合；二是因大陸與西方國家收入水平與消費行為差別很大，投資行為不易獲得市場認同^②。但隨著九十年代跨國公司大舉進入，歐美國家的投資比重與規模已加大，投資的方式亦出現多元化。

大陸的利用外資政策，影響了 FDI 的投資方式、投資結構、資本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技術結構、地域結構、就業結構等等。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外國直接投資將根據其全球化資源配置的效率為其考慮的投資因素，因此，大陸在制訂外資政策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外資企業投資績效的要求，尊重市場的機制，不能作太多政治的干預。相關政策的制訂，需要既能符合外資企業獲取利潤、投資資源作有效的配置的目標，又能使大陸本身持續獲取外資進入所創造的經濟、社會效益，如何使兩造的需求相結合，才是外國直接投資是否獲取雙贏的重要因素。若是不然，外資將以減少進入為其選擇。

大陸現階段的利用外資政策已不再是無條件的接受 FDI，而是有管理、有監督和有規範。是一個從內外有別到平等競爭、從提供優惠到規範管理的演進過程。目前，外商投資雖集中於勞動密集的製造業，但因經濟發展所需，未來將對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將日趨活絡，大陸當局鼓勵的產業與行業，將成為投資新焦點。為平衡東、西部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差距，鼓勵前往中西部的投資政策，仍將繼續推動，其效益有待進一步觀察。

* * *

註② 裴長洪，「對外商來華投資增長潛力的分析」，文載劉國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編，一九九九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頁二三三～二三九。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Yong-sheng Chen

Abstract

Ever since 1978, when China adopted opening polic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which explain the sources of FDI, the necessities for using FDI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effect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 using FDI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Other factors, such as industrial policy, FDI policy, the capacity of the host country,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se of China,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DI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cludes that FDI contributed to aspects of capital formation, trade expansion, rising employment rate, and institutional demonstration effect but not technology transfer. FDI brought some corresponding issues, such as inflationary pressure, less improvement in R&D, disparity in economic regional development, monopoly of the inner market, and threats to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past years, China's FDI polic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tching her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 enhancing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policy effect has been positive.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FDI policy

